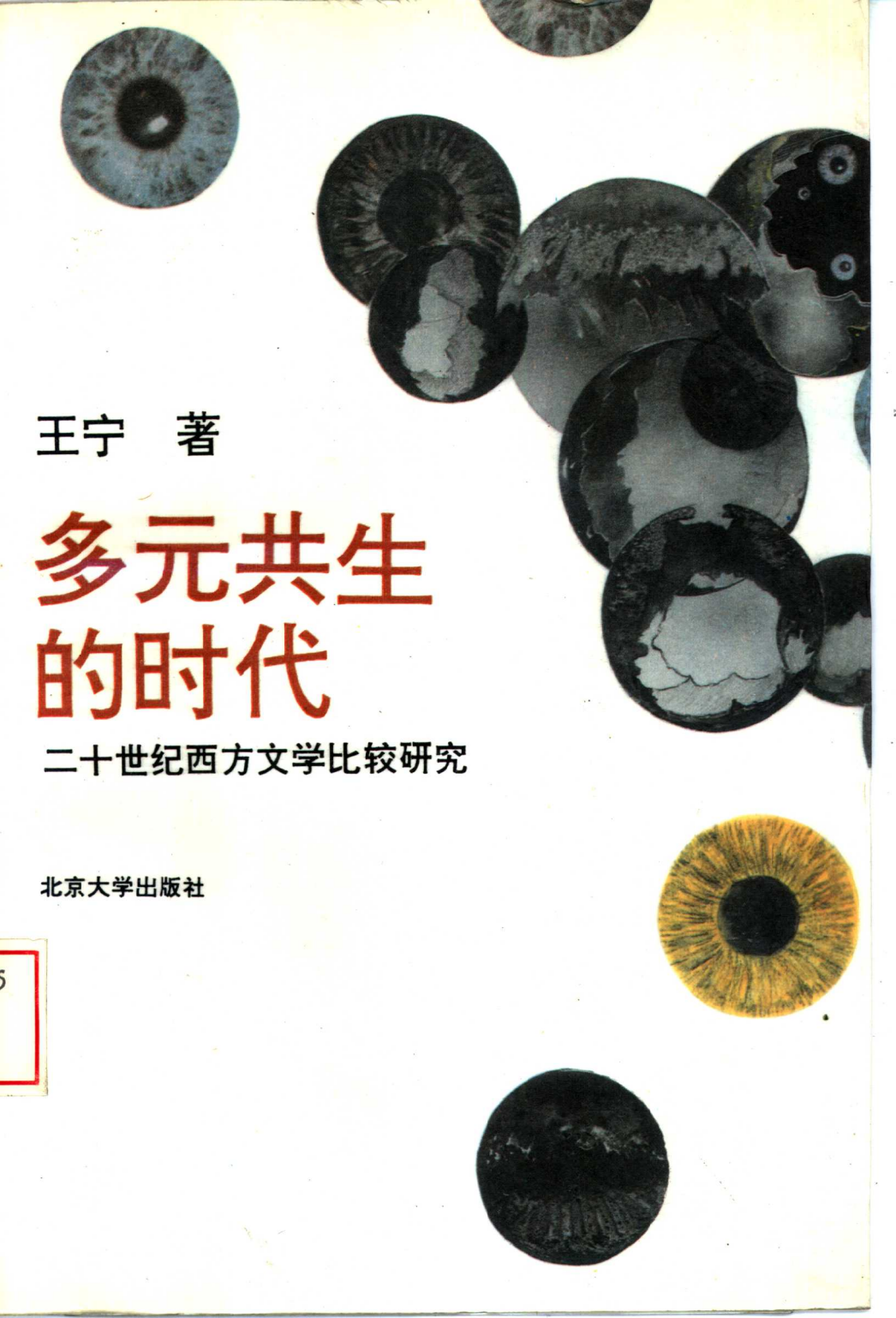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decorated with several circular, abstract patterns that resemble eyes, galaxies, or cross-sections of certain minerals. These pattern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with some in the upper right and lower right corners, and others more centrally located. They vary in color, including shades of blue, grey, black, and yellow.

王宁 著

多元共生的时代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多元共生的时代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

王 宁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北京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王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

ISBN 7-301-02179-8

I ①多… ②二…

Ⅱ. 王…

Ⅲ. 外国文学-对比研究-现代

Ⅳ. I109.5

出版者地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印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80千字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95元

序

李 赋 宁

王宁同志的论著《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将要迈进二十一世纪的年代里，免不了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期推动世界文学更健康地发展，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智慧和教益。王宁同志的论著在一定范围内总结了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学的某些成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无论从宏观角度或微观角度来看，这本书都有它的认识价值。

我在这里想借此机会谈谈外国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王宁同志的成长过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启示。既然新时代是多元共生的时代，是走向对话的时代，那么东西方文学势必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对话。中国文学要进入世界，世界文学也要进入中国，和中国文学进行对话。我们需要的文学研究人才必须既熟悉中国文学，又熟悉外国文学。这个主张早已被老一辈的作家和学者所阐述，例如鲁迅、闻一多、吴宓等人。鲁迅研究中国小说，闻一多研究《诗经》和《楚辞》，吴宓研究《红楼梦》等，莫不借助于外国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们培养文学研究人才的高等院校必须着眼于通才教育，必须开设世界文学课程，介绍世界名著和文艺思潮、流派，鼓励应用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评论五四运动以来的我国文学作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高校文学系科必须加强外语阅读、写作和翻译的训练，培养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以及少数的文学史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

王宁同志的成长道路是健康的,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大学本科学习以及毕业后留校担任公共英语教学期间,王宁同志打好了比较扎实的外语基础,同时阅读了相当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英、美文学原著,并且开始翻译和评介外国文学中的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这三方面的基本功——阅读、翻译和评论——是文学研究人才必不可少的。王宁同志着重练好了这三方面的基本功。他于八十年代后期考取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比较文学和英国文学专家杨周翰教授。通过名师指导和他个人的勤奋努力,王宁同志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西方文艺理论和方法如何影响了五四以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他对弗洛伊德主义如何影响了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和施蛰存的早期小说创作的研究,表现出独到的见解,受到了专家们的称赞。王宁同志获得北京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介绍当代西方文论,深入、细致地分析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影响。通过发表多篇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和在欧洲几个大学讲演及座谈等活动,王宁同志扩大了视野,增加了见闻,建立了学术上的联系,他正在继续不断地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我希望王宁同志本人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深入钻研,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在学术领域中更上一层楼。

1992年5月于北京

王宁 博士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出版委员会委员

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学报编委



目 录

序	李赋宁
---------	-----

上编 思潮论

第一章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3)
第二章 弗洛伊德主义:无意识与文学的联姻	(29)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文学:挑战与超越	(77)
第四章 先锋小说:走向后现代主义	(97)

中编 批评论

第五章 从形式到分解的历史演进	(125)
第六章 精神分析:从人本到文本的演进	(142)
第七章 后结构主义:批评的解构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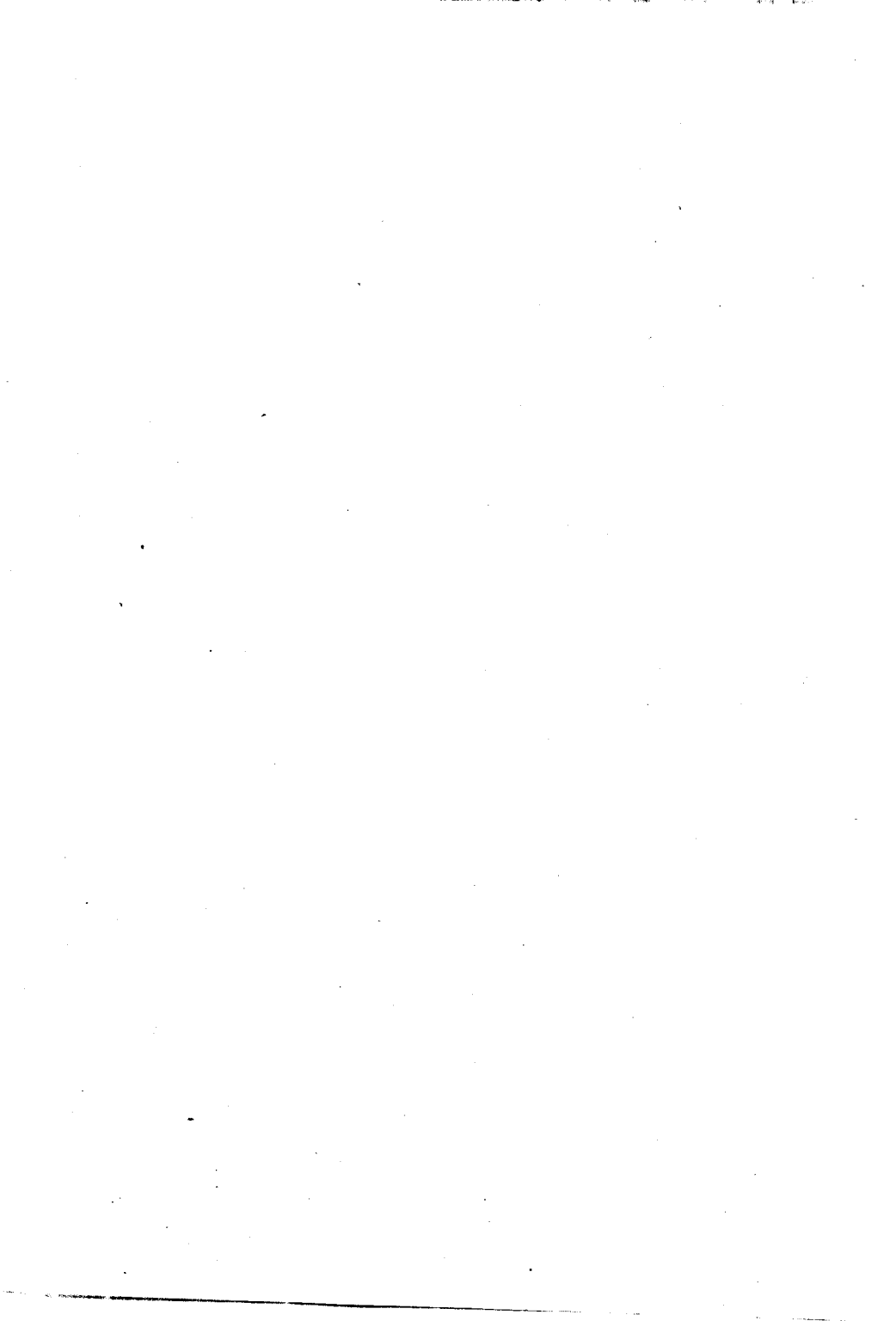
下编 作家论

第八章 二十世纪文学之镜	(193)
--------------------	-------

第九章 杰克·伦敦: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	(214)
第十章 艾略特:永恒循环的神话	(244)
第十一章 海明威:现代文体的探险	(267)
第十二章 菲茨杰拉德:沉默的“桂冠诗人”	(291)
第十三章 索尔·贝娄:没有终极的寻找	(311)
后 记	(333)

上 编

思潮论



第一章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

二十世纪即将进入它的最后年月了，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作为现代时代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卓越体现，将载入世界文学的光辉史册。今天，“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神话虽然已被打破，但人们却不得不承认，本世纪西方文学的成就及其对全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它那绚丽多姿的风采给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增添了夺目的辉耀，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在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作出回顾和总结时，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些风格迥异的思潮流派的名字：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迷惘的一代、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样一些闪光的身影：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艾略特、庞德、叶芝、肖伯纳、乔伊斯、伍尔夫、康拉德、普鲁斯特、法朗士、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卡夫卡、易卜生、奥尼尔、加缪、萨特、索尔·贝娄、马尔克斯、聂鲁达、贝克特……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但全面总结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并非本章所能完成，本章的任务旨在对本世纪前九十年内曾占主导地位或现在仍居主潮地位的三种西方文学思潮作一宏观的勾勒，而对具体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及作家作品则不作详论。

根据当今西方流行的新历史主义观念(NewHistoricism)，每

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是那一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因此在描述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主潮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只有把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西方文学的总体特征和精神。

早在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的急剧发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迅速发展到了垄断竞争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终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但随着它的盛极至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日益激化，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企图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工业寡头和金融寡头相互勾结，残酷地压榨工人群众，致使失业大军不断充斥街头，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进一步激化。

十九世纪后半叶，各种流行的思想观念伺机扩大自己的影响，侵袭人们的固有观念：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力意志论、生命活力论、遗传基因论、分析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新人文主义开始先后占领知识领域和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也同时在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界广泛传播，对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更以其理论体系的完备和论证分析的精辟打动了更为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本来就对资本主义社会深恶痛绝，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受奴役、受欺凌的地位，进而奋起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当时的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罢工斗争如火如荼，居于劳资激烈冲突和斗争之间的中小知识分子，则终究难以摆脱那种动摇不定的软弱性。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有所洞察，预感到这一危机四伏的社会已无可指望，必然逃脱不了崩溃的厄运；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对马克思主义不甚理解，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与广大劳动群众格格不入。他们对现实感到幻灭，对未来又失去信心，或者缅怀人类文明史上的某个兴盛时期，或者彷徨、踟蹰在思想的

“荒原”上。这批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本来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抱有幻想，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则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这种美妙梦想。俄国十月革命虽然给他们以某种震动，但终究未能引导他们走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道路。崛起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倒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寄托。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拉开序幕的。

这一时期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流派众多和追求标新立异。有些思潮流派尚可略领风骚二十年，有些则连三年、五年也难以维系。有些显赫一时的作家生前颇受批评界推崇，甚至红得发紫，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批评风尚的转向，他们曾几何时却成了明日黄花；倒是另一些作家生前倍受冷落，死后却随着各种新崛起的批评流派的出场逐渐被“发现”、被阐释甚至被赋予各种“大师”之类的桂冠。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文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蜂拥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对固有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及作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形式技巧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叔本华、柏格森、尼采、斯宾塞、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名字几乎可以在任何一部描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西方文学的著作中见到。当代美国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说得好：

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现代文学重新带来了被十九世纪的科学所忽略了的那些东西。对于不见了踪影的“生命”、“有机组织”(organism)、“功能”(function)、“瞬间的现实”(instantaneous reality)、“相互作用”(interaction)这类东西，人们此时可用威廉·詹姆斯的激进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亨利·柏格森的生命活力论(élan vital)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来予以填补。这些人并不只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还是超凡出众的作家，正如体现在

《心理学原理》(1890)、《时间和记忆》(1896)和《释梦》(1900)这些著作中的那样,他们对人类知识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对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们本身也已成为这一文学的经典部分。^①

确实,诚如卡津所说,这些文学以外的思潮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而且还不断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渗透并影响到文学的本体,有的甚至成了本世纪西方文学的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诗人”甚或更早些的颓废派文人的思想倾向之基础;柏格森虽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却由于“其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及表达的卓越技巧”而荣获了192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他的著述成了本世纪的一个独特文学现象——“诺贝尔文学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尼采不仅自己擅长写诗,无愧于“悲剧诗人兼哲学家”的称号,而且他描绘的“金发碧眼”式超人形象不时地出现在本世纪头三十年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大师和哲学家,其影响倒是更见于本世纪的西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他所荣获的1930年度“歌德文学奖”更使他本人也跻身于文学家的行列;斯宾塞和荣格则分别以其思想倾向的激进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批评家的观念方法;威廉·詹姆斯作为意识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功绩也已载入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册。

三十年代的西方文学在本世纪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致使西方国家首当其冲,大批作家迅速向“左”转,靠拢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运动从此一蹶不振,逐渐江河

① 阿尔弗雷德·卡津《现代文学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Literature),收入论文集《当代人》(Contemporaries),小布朗公司,1962年版,第5页。

目下。在描述“红色的三十年代”的西方文学的著述中，我们同样可以颇为频繁地见到马克思的名字。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导致这一阶段的文学走向分化：一部分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的左翼文学，另一部分则公然成为纳粹法西斯的御用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它的文学也更加令人瞩目。法国的新小说派、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德国的“废墟文学”等异军突起，显示出不同的丰姿。弗洛伊德主义再度崛起，并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一起成为战后西方文学的重要哲学基础。

有人说，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我认为这种描述同样适用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创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多元格局并非国别地域意义上的多元，而是思想倾向和风格形式意义上的多元，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多元流向。但是，如果我们一以贯之地从整体上来把握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就可在拨开所有阻挡我们视线的分枝蔓叶之后，大致清晰地看到一个三种思潮更迭交替并且在不同时期各占鳌头的格局。实际上，这三种思潮都曾有过自己的盛期，它们有时相互对立，有时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会消失殆尽。本章的任务就是为这三种思潮的兴衰流变作出粗略的描绘。

一 现实主义的衰落

对现实主义的任何界定或描述，似乎都难以尽如人意。这个问题不仅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引起过多次论争，即使是在历时 2500 多年的西方文论史上，对现实主义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或描述。只要我们翻开不同版本的西方文学史著作，就不难发现，有些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作家，在西方学者那里却被归为自然主义作家，例如美国的斯蒂芬·克莱恩、杰克·伦敦、弗兰克·诺里斯等

人就曾受到过这种待遇，其理由是他们的创作深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而且他们的作品语言过于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等等。也有些被我们认为是现代派的作家却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如亨利·詹姆斯、伊迪斯·华顿等，其理由则是因为他们的描写在细节上真实，语言纤细优雅不俗。在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斯·麦克法伦(James McFarlane)编著的《现代主义：1890—1930年》(Modernism: 1890—1930)一书中，编者就把海明威、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创作思想基本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也归为现代主义作家，而从书后的作家小传来看，几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西方的主要作家都卷入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①。这样过于宽泛的划分自然无可厚非，因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两种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本来就不可能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有的作家在思想倾向上很合现代主义的拍子，但在文学创作上却依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虽然偶尔也借鉴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但基调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例如海明威、托马斯·曼就是如此。也有的作家早年曾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也写出过一些洋溢着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但在现代主义运动高涨之时，他们却置身其中，并且成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例如乔伊斯、劳伦斯等作家就是如此。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即使我们拿公认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高尔斯华绥、萧伯纳、斯坦倍克、辛克莱·刘易斯以及更早些的托马斯·哈代等同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相比较，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明显差异。如果我们再朝前推进一步，把莫泊桑和福楼拜的小说同巴尔扎克的小说相比，也依然可见出较为明显的差别：在莫泊桑那里，常以构思的精巧和描写的简洁取胜，他的一些作品甚至接近于自然主义；福楼拜则更为注重形式

^① 参见该书附录“作家小传”，企鹅丛书，1976年版。

技巧,有时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理想,因此难怪有批评家把他归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远祖之一;巴尔扎克与这两位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擅长以编年史的描写方式和史诗一般的雄浑风格构筑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他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构筑起来的丰碑——《人间喜剧》至今对我们认识彼时彼地的社会生活风貌,仍是一份难得的有着艺术价值的文献资料。

既然都属于现实主义,却又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这要从三个方面来作阐述。

首先,我们应当考虑到作家在对一种思潮或美学原则的接受时所应当具有的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任何文学思潮或美学原则在化作具体的文学创作并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之前,必然首先进入作家个人的接受屏幕,同作家的期待视野发生作用,进而发生某种形变,经过作家带有强烈主体意识的选择、接受和创造性转化而成为一件具有审美功能和特征的艺术作品。既然各人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不尽相同,因而反映在作品中的审美倾向就判然有别,对一种创作方法或艺术技巧的运用也必然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越是艺术上有造诣的伟大作家,其作品就越是带有非他莫属的个性化色彩,这就使我们见到了现实主义内部的千姿百态。我认为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我们就自然想到了第二个方面,即现实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自然会呈现出符合彼时彼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不同丰姿。现实主义也有着自己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高峰阶段和衰落阶段,既然前三个阶段已在十九世纪的大半时间内完成了,那么到了十九世纪末,它便盛极至衰,其主导地位自然而然地逐渐为新崛起的思潮流派所取代。这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现实主义的必然归宿。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我们论述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即我们